

人民日报

思想评论集

第一集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人民日报思想评论集

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 32开本 印张1 $\frac{1}{2}$ 字数32,400

1978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20,000

统一书号3132·007 定价0.10元

目 录

从口号想到的·····	樊庆荣 (1)
反对形式主义·····	解 斯 (4)
“白专”帽子决不能乱扣·····	黎 烈 (7)
威信从何而来? ·····	林 木 (10)
余悸和余毒·····	毓 璜、怀 德 (12)
标准只有一个·····	张 成 (14)
外行要变为内行·····	凌 云 (16)
从延安整风谈起·····	徐 逊 (19)
是做官还是革命? ·····	嵇 思、章 云 (22)
斥“血统论”·····	章 云 (25)
谈“来头”·····	燕 钧、季 云 (29)
到群众中去·····	章 云 (32)
评“有权即有理”·····	余 思 (35)
法和言·····	梅 鉴 (38)
“铁饭碗”与瞎指挥·····	靳 军 (43)
提倡互称同志的风气·····	谭宗级 (46)

从口号想到的

樊庆荣

在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，广大群众和干部正在甩开膀子，大干社会主义，革命和生产搞得热气腾腾。可是，也有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，同这种大好形势很不适应，在他们身上，“四人帮”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。他们讲起话来，空空洞洞，没完没了，尽是些不联系本单位实际的、人云亦云的套话；开起会来，抄抄报纸、念念稿子，既不研究也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；不管上面布置什么工作，照例是开个大会，做个计划，发个号召，提个口号，照抄照转地布置一下就算完事。就是口号，也往往是千篇一律，年年一样。倘是企业单位，年初照例是“争取开门红”，年中就是什么“大干多少天，五一把礼献”，到了年终，无非又是什么“再加一把劲，提前进入××年”。对这些领导干部来说，似乎发出号召，喊了口号，这就是他们的领导工作，他们甚至因此而心安理得，如果群众对此提出批评，他们还感到十分委屈。

这里，不禁使我们想起斯大林同志在联共（布）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说的那个著名的例子。斯大林生动地描写了那些光讲空话、不干实事的干部，他说，当我们把这些人撤职的时候，他们还会摊开双手问：“究竟为什么要把我

们撤职？难道我们没有把一切必要的事情都做了吗？难道我们没有召集突击队员大会吗？难道我们没有在突击队员会议上宣布党和政府的口号吗？难道我们没有把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选为名誉主席团吗？难道我们没有给斯大林同志拍致敬电吗？——你们究竟还要我们做些什么呢？”

可惜，斯大林当年尖锐批评过的这种干部，在我们这里仍然不乏其人。

本来，在一定时期内，为了完成某项任务，领导上提出一些战斗口号和号召，作为组织和动员群众的一种方式，是完全可以的，也是必要的。但是第一，这种口号和号召，应当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针对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，符合客观的实际；第二，提出口号和号召，只是事情的开始，而不是工作的结束。随着而来的，要有一系列的工作和组织措施，要及时地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，要努力使提出的口号和号召能够完满地实现。这样，口号和号召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力量，才能真正起到组织群众、动员群众的作用。否则，口号和号召就只能成为表面文章，成为毫无用处的空话、废话，提得越多，作用越小，久而久之，领导干部把它当成应付公事的“口头禅”，群众也就自然把它当成无需认真对待的“耳旁风”。

说空话是林彪和“四人帮”的特点。林彪和“四人帮”一类政治骗子，为了掩盖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面目，欺骗群众，打扮自己，革命口号喊得震天价响，高调比谁唱得都好听。其实，他们既不相信，更不准备实行。他们干的完全是反对革命、破坏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。打倒了“四人帮”，我们要认真肃清“四人帮”的流毒和影响，把被“四人帮”破坏了

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。空喊口号，不干实事，这种作风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、不尚空谈的优良传统是背道而驰的。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。我们提出的战斗口号和奋斗目标，不是为了好听，而是必须领导群众付诸实现的。光说不干，即使学大庆、学大寨、实现四个现代化喊得再响、再多，也是没有意义的。

(原载1977年12月23日《人民日报》)

反对形式主义

解 斯

林彪和“四人帮”是假左派、真右派。林彪为了背后下毒手，大搞“语录不离手，万岁不离口”的形式主义活动。林彪搞的那套早请示、晚汇报、忠字舞、语录操，广大群众当时就很反感，比较容易识破。“四人帮”发展了一套比林彪高明的手法，念念不忘“政治”、“路线”、“理论”。他们挂羊头、卖狗肉，把资产阶级政治、反革命路线、修正主义理论挂上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牌子，贩卖推销。搞这一套，一是容易骗人，二是可以吓人，谁敢有点不同意见，反革命帽子就扣到你的头上了。

在林彪和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日子里，当干部的真是提心吊胆，做个报告，写篇文章，必须字字句句都有所本。生怕实的多讲了一点，会被抓住“业务挂帅”的辫子；虚的少写了一点，又会被扣上“不突出政治”的帽子。只好依样画葫芦，你怎样讲，我也怎样讲。开会会来，照本宣读；写出文章，千篇一律。群众对那时候的报纸、杂志，讨厌极了，根本不想看；但它们却也有个用处：开会时要你发言，或者要你起草个报告、写篇文章，可以找来照说照抄。

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，有多少事情要做呵！和“四人

帮”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要彻底查清；被“四人帮”搞乱了的理论是非、思想是非、路线是非要纠正过来；被“四人帮”破坏了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恢复和发扬；为了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，各条战线都要大干快上；二十八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要总结；一大堆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，真是百废待兴；许多新课题等待我们去熟悉，去掌握，可以说是迫不及待。广大人民群众对做好这些事情都有很大的积极性。为了建设我们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，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，人民群众多么希望各级领导干部，对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，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，发现矛盾，分析矛盾，拿出解决矛盾的办法。群众迫切要求领导干部要有魄力，有本领，办实事，讲实效，真正解决问题，彻底肃清“四人帮”的流毒和影响，千万不能再搞那套说大话、说空话的形式主义了。

华主席在这方面给我们带了头，现在已经有一大批干部，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，敢于说话，敢于负责，事情办得又快又好。他们深受群众欢迎，不愧为群众的带头人。但是，也还有一些干部因循守旧，固步自封，他们对群众的呼声，对群众的迫切要求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能推就推，能拖就拖，甚至能压就压。开会作报告，上头文件所说的句句不漏，下头实际则丝毫不联，最多也只是蜻蜓点水；讲起成绩来头头是道，说到缺点和问题空空洞洞，讲成绩可以列举一大堆数字：开了多少次批判会、学习会，有多少人作了“三大讲”，有多少人去参观学习，定了多少种规章制度，写了多少篇学习笔记，等等。听起来真是热热闹闹，可是实际效果

在哪里，具体进步在哪里呢？看不见！对于这样的领导，群众从热望、希望，终而是失望。

这样的干部现在还为数不少，不过，他们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。有些人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他们前几年被“四人帮”的帽子、棍子吓坏了，至今还心有余悸，觉得搞形式主义保险。有些人是头脑里“四人帮”的流毒没有肃清，还以为这是“突出”了“政治”，认为搞形式主义正确。有些人当官做老爷惯了，觉得深入群众、深入实际太麻烦，搞形式主义省劲。有的人本来就是“风派”，为了保住乌纱帽，什么风来就跟什么风跑；现在他还要看一看，等待有朝一日什么西北风刮了来，他又可以“一贯正确”，算定搞形式主义非常有利。

平定县委书记李锁寿同志的事迹，是对种种搞形式主义的干部的有力批判。李锁寿同志走马上任，一发现群众运煤困难，立刻就组织运输队，亲自领导，解决了群众的实际问题，带来了党的温暖，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。李锁寿同志带领县委一班人，到一个个公社、一个个大队去调查研究，发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；敢于顶“四人帮”的歪风，敢于大批资本主义，大干社会主义，两年就使平定大变样。

奉劝那些还在搞形式主义的同志们，要向李锁寿同志学习，真正走到群众里面去，了解群众的心理、情绪、意见和要求；把现在能够解决的问题，一个一个解决，暂时还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一个一个向群众说清楚，群众是通情达理的。一定要讲求实效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坚决抛掉形式主义！

（原载1978年1月31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“白专”帽子决不能乱扣

黎 烈

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日子里，“白专”帽子满天飞。谁要是在业务上多下一点功夫，更不要说去精益求精，“白专”帽子就会落到他的头上。对“四人帮”乱扣这种帽子所起的反动作用，我们不能低估，真可以说，它使得百花憔悴，万马齐喑，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教育、科学技术事业，遭到了极大的破坏。

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一年多了，一提到“白专”，不少的人仍然心有余悸：“我努力去专，是不是有一天又有人给我扣上‘白专’的帽子？”这证明，“四人帮”在白专问题上制造的混乱依然存在，实有必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。

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专。什么是“专”？那是没有什么疑义的，是一目了然的。

至于什么是“白”？当然不是指自然色的“白”。

这里所说的“白”，是从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传入中国的。我们打开俄国革命的历史，阅读当时俄国的文学作品，看看有关的电影，都能够碰到这个“白”字：“白党”、“白军”、“白匪”。“白”字含义非常明确，“白”与“红”是敌对的，指的是反对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反革命党派、反革命军队和反

革命匪徒。

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文献中，“白军”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，“白色势力”是指反革命力量，“白区”是指国民党统治区。“白”字的含义也是确定的，是反革命。《洪湖赤卫队》里的赤卫队员，不就是把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叫做“白狗子”吗？

大家还记得去年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写的一篇文章吧！那篇文章的题目是《要知松高洁，待到雪化时》，副题是《推翻“四人帮”对〈汇报提纲〉的诬陷》。这篇文章对“白”字作了精辟而正确的解释：“‘白’是一个政治概念，只有在政治上反动，反党反社会主义，才能说是‘白’。至于拥护党，热爱祖国，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，但世界观还没有完全改造好，在思想上、作风上还有这样那样毛病的知识分子，是不能称为‘白’的。”可见“白专”这顶帽子，决不能到处乱扣。究竟有没有“白专”分子呢？有的。“四人帮”豢养的那批专门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御用文人，如罗思鼎、梁效、唐晓文之流，不就是典型的“白专”分子吗？

我们不少同志对“四人帮”乱扣“白专”帽子，十分愤慨。但是义愤代替不了肃清流毒。

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陈景润同志的事迹在报上发表之后，议论纷纷：陈景润是红专，还是白专？这个问题的提出，就说明了一些同志的认识有待提高。

有人说陈景润同志的政治学习不怎么样。但是，我们看到，他长期以来刻苦钻研数学，钻得很深，甚至钻得发呆，经常到夜里一、两点，两、三点钟才睡觉。在数学研究上，他付出了艰巨的劳动，取得了成就。陈氏定理得到了国内国际的公认。

“政治学习不怎么样。”应该怎么看？说实话，近年来，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干扰、破坏下，政治学习大搞形式主义，翻来复去老一套，只图走过场，不去求实效，谁会耍嘴皮子谁吃香，实在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。陈景润同志拥护党，热爱社会主义，努力钻研业务，难道能把他说成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专家吗？能把他说成是“白专”吗？

我们判断一个人，不是看他的声明，也不能看他是否说得好听，而主要是看他的实践效果。只有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才是检验主观愿望和动机的标准。有的人满嘴马列主义词句，天天高喊突出政治，而对自身业务不甚了了，对党对人民无所贡献，你能承认他是“红”吗？陈景润同志脚踏实地，埋头苦干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精通业务，有所发现，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贡献，难道能说他不红吗？

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陈景润同志是有他的不足之处，然而，不足之处，人皆有之，不能求全责备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只要他拥护党、拥护社会主义，刻苦钻研业务，有所发现，有所发明，有所创造，有所前进，对人民对国家作出了贡献，就应该受到鼓励、赞扬和尊敬。

结论是，要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，要明辨是非，就必须弄清“白专”的含义，不能给人随便乱扣“白专”的帽子。谁要乱扣，同志，你就理直气壮地给他顶回去，继续走你又红又专的道路！

（原载1978年2月11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威信从何而来？

林 木

“无私功自高，
不矜威益重。”

这是何等高贵的无产阶级领导者的品格啊！说的是谁？
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。

这两句，出自赵朴初同志的《周总理挽诗》。写得好。好在不仅刻画了周总理崇高的形象，而且道出了一个真理：威信是从“无私”、“不矜”中建立起来的。

威信从何而来？是从地位来的吗？是从权力来的吗？是从老资格来的吗？统统不是！只有旧社会的官僚才靠这些建立“威信”。最近看到一封读者来信，说有一个县委机关，已经有了十多辆汽车，书记还嫌不够，最后又买来一辆红旗牌轿车。于是，书记出巡，汽车成列，“红旗”开路，威风凛凛。这位书记居然想靠“红旗牌”建立“威信”！写信人在信中问道：“县委为什么威信不高？”他列举了几件事情，小汽车之多就是其中之一。

有些人认为，只有一贯正确，从来不犯错误，威信才高。他们恰恰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：不犯一点错误的圣人是没有的。有了错误，是勇于承担责任，还是上推下卸？是作自我

批评，还是文过饰非？这同一个领导人的威信大有关系！有的同志，听不得不同意见，谁要敢于进行批评，就压制、打击，甚至组织围攻。应该说，这样办，正是搞垮威信的最有效的办法。

威信是人为地树立起来的吗？根本不是。威信是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！有人不信这一条，喜欢拉一帮子人，抬轿子，吹喇叭，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找到了提高威信的窍门，其实蠢得很，连最起码的真理都不懂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是非自有公论。

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，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，在国内国际享有崇高的威望。难道是什么人树立起来的吗？林彪这个极端卑鄙的阴谋家、野心家，妄图贪天之功以为己功，叫嚷什么“大树特树”，吹嘘他发现了什么“天才”。对于林彪这种两面派手法，毛主席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：他是名曰树人，实则树己。林彪和“四人帮”费尽心机，采取种种卑劣手段，妄图大树特树他们自己的威信。结果怎么样呢？还是那句老话：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！

奉劝那些还在有意无意地想树自己“威信”的同志们，应把林彪和“四人帮”作为难得的反面教员，从中汲取教训。我们永远要以毛主席、周总理、华主席为榜样，只有努力做到无私、不矜，才能真正取得人民的信任。

注：矜(jīn 今)自尊自大的意思。

(原载1978年2月14日《人民日报》)

余悸和余毒

毓璜 怀德

批判“两个估计”的战斗一打响，教育战线精神大振，局面顿开。革命师生跃马横枪，挥戈上阵，其势似钱塘春潮，如暴风疾雨。然而，在这场战斗中，也有人荷戟彷徨，心有余悸。

“余悸”在于心，踟蹰见于形：

你要加紧把基础理论教学抓上去，他有顾忌：“可别重犯‘脱离实际’的毛病。”

你要保证教师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，他有犹疑：“可别再吃‘脱离政治’的苦头。”

在打倒“四人帮”，教育得解放的今天，一些同志“心有余悸”，看来有点怪，其实也不怪，它正是“四人帮”横暴恣肆地推行“两个估计”，挥舞帽子、棍子所留下的恶劣影响。“两个估计”实际上是“四人帮”在教育战线上推行的一种反革命三光政策：它要把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一下子扫光，把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伟大成绩一下子抹光，把革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一下子打光。在“两个估计”风靡期间，教育领域处处埋“地雷”，处处划“禁区”。广大教育工作者头上套帽子，身上挨棍子，手脚戴铐镣，精神披枷锁，动辄得咎，寸步难

行。“四人帮”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对教育工作者疯狂地实施法西斯专政，要把教师“永远按在深水之中”，要让子弹“穿过教师的身体”。他们蓄意把教师从政治上搞臭，思想上搞乱，业务上搞空，生活上搞苦，弄得校无宁日，班无宁日，人无宁日，教育事业蒙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，教育阵地出现了万马齐喑的景象。至今一些教育工作者头上还留有“四人帮”帽子勒下的箍印，身上还留有“四人帮”棍棒打成的创伤，而这“痛定思痛”的“余悸”本身，就正是“四人帮”在一些同志精神上留下的一块伤疤。

当然，一些同志“心有余悸”的精神状态，还有其自己思想上的因素。对待过去的“伤痛”有两种不同的态度。多数同志在批判“两个估计”的战斗中，把“伤痛”化为仇恨的力量，积极杀上批判“两个估计”的战场，他们在斗争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，敢于拨乱反正，肃清流毒，表现了革命者大无畏的气概。少数同志虽然也批判“两个估计”，但由于流毒未肃清，界线未划清，思想未澄清，前途未看清，心里不踏实，表现在行动上则是等待观望，束手束脚。事情很明白：“余悸”的根子，正通在“余毒”上。“余毒”不清，“余悸”难消。要将消极的“心有余悸”化为积极的勇敢进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斗争中进一步肃清流毒！

（原载《新华日报》，1978年2月18日《人民日报》转载）

标准只有一个

张 成

真理的标准，只有一个，就是社会实践。这个科学的结论，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，才得到的。

哲学家们提出过各种真理的标准。笛卡儿说，只有象几何学上的公理那样清楚明白的，才能叫做真理。这种说法，看起来似乎有道理，但是，究竟怎样才是“清楚明白”，连他自己也说不明白。王阳明把“良知”定为真理的准则，那就是“一切凭良心，根本不承认有什么客观标准，只能是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。实用主义者说，“对我有用的就是真理”，赤裸裸地把资产阶级的利益当作判断真理的标准。基督教会说，耶和华说的才是真理，一切都要拿圣经作标准，圣经上反对的就不许做。

总之，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，人们总是从认识、意志、思想、理论中寻找真理的标准，因而，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客观的检验真理的标准。

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类认识史上这个老大难的问题。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哲学，它把社会实践引进了认识论，认为认识依赖于实践，实践是认识的基础。通过社会实践而发现真理，又通过社会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